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03.004

维新的“时差”：维新思想的地方化实践

余沐苓 宋素红

摘要 学术界对维新思想传播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新式观念如何从中心城市向地方扩散,往往忽略了地方视角下维新思想的开展实践。本文借助“复线的历史”的研究视角,通过分析报纸、日记和回忆录等史料,勾勒出川陕等地的维新实践活动。研究发现:地方维新实践拥有各自的“时间线”,并非全都是在中心号召下的闻风而动,各地维新运动的领袖作为承接全国与地方信息沟通的关键人物,对维新思想也进行诸多“地方性转换”;广大县乡地区,在缺乏报纸、学会、学堂“三位一体”的理想传播结构下,书院成为接续维新思想落地的重要中介,地方普通读书人眼中的维新也呈现出多重面貌。

关键词 地方维新;中心;传播;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余沐苓,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宋素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一、引言

马叙伦十三岁时已辗转杭州周边跟随不同的先生读书,直到 1899 年一位范先生以活泼的教法才让他对读书产生兴趣,此时已是戊戌政变之后。那时他脑海中已形成了有关维新的模糊印象,但对维新“兴学”的具体内容却不甚清楚。“我在那时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晓得变法是为什么。那时杭州已有了求是书院,是新式教育机关,我却没有晓得。”^[1]对于地方读书人而言,“维新变法”是比较抽象的概念。马叙伦所在的养正书塾尽管订阅了《申报》《新闻报》和《中外日报》,但只限教员阅读,当历史教员把时事告诉“我们”,马叙伦才“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

这段维新时期地方读书人所经历的具体人生,不仅构造出重回历史现场般的细节,也提醒我们关注在康梁等维新巨子主导变法的叙事之外,还有地方社会的维新实践。美籍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历史本身有喧哗的众声和多层次的叙述结构,而“线性的历史”假设历史有明确持续统一的主体、历史分期和确定的进化性,这就会隐匿和压抑一些叙述^[2],因此他提出“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研究范式,试图“打破历史叙述结构的中心地位或既定性”^[3]，“在历史的缝隙和裂纹中去反读历史”^[4]。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解释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5]。

维新运动由康梁领导并推动,但它同时也是一场由遍布多地的多个主体

参与的活动。据统计,1895年至1899年间,全国成立的学会有103个,分布于10个省和31个不同城市,全国兴办的学堂约150所^[6],中文报刊有一百一二十种,80%是国人自办^[7]。“发生在北京的在思想层面的戊戌维新,在其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大潮中,犹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只是历史的较浅层次,更深的本体还在它的历史展开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之中。”^[8]事实上,维新运动在很多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无论是1891年写出《时务论》的宋育仁,还是1895年经李岳瑞寄来的康有为历次上书诸稿及《强学会序》《章程》,方知世有“康先生其人”的刘古愚,都暗示着在维新运动中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亦即历史发展的“复线”。正如王汎森所说:“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潜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9]

随着研究的深入,维新运动如何在地方开展的研究视角也逐渐打开。在个案研究方面,以对湖南的研究较为突出。梁启超加入时务学堂被认为开启了湖南维新的新局面,而湖南维新的宣传阵地有赖于湘、鄂、沪报人的“同人交推”^[10],维新思潮在湖南的集体化表达和在地发展离不开学会、学堂和报刊的一体化^[11]。强学会及其序言所表露的价值取向,成为陕西味经书院办院的旨趣所在^[12]。上述研究探讨了各省维新运动的人员构成与开展特征,但蕴含着由中心城市向地方传播的观点。无论是办报刊还是开学堂,经济基础好、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具有优越条件,并成为维新运动开展的天然优势,但不应忽视的关键是维新的观念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考察中^①,这种“地方性”不是士大夫以朝廷/国家为中心营造出来的文化观,将地方的历史叙

述纳入国家话语的体系,而是将当地人的观点置于相对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13]。在这方面,刘熠讨论了在地方督抚、学政和州县官的推动下,四川的维新节律受朝局影响但在较大程度上不同于朝廷的情况,他们眼中的“变法”意味着由专学八股转向注重经学、词章^[14]。对于“官方”和“西人”两边的疑虑是促成温州士人在维新风潮中发挥在乡能动性的重要原因^[15]。这些研究体现了重新理解地方观点、知识传递和表达方式的努力,拓宽了维新运动地方实践的议题。

本文所指的维新运动并不仅仅是从1895年公车上书至1898年变法失败的短暂历史事件,而是倾向于将其看作一场持续性救亡启蒙思想的实践过程。因为维新运动思想资源的积累与酝酿的时间很难界定,对于不同地方而言“维新”的发生可能也存在“时差”。需要指出的是,发掘维新运动的地方化实践并非否认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关键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作的贡献,而是探索“主线”以外的复线,以及地方的主体性^[16],从而实现了对全局的历史的理解。

鉴于以上研究的启发,本文借助报刊新闻、时人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尝试探索维新运动的地方化实践,并回答以下问题:维新思想如何传入地方?地方维新的主体性有何表现?地方官员、士绅、普通读书人如何开展并理解维新运动?

二、同步:维新运动向地方传播

引领维新事业发展的先锋《时务报》,是维新思想传递的重要载体和新式知识分子主要的阅读对象。1901年梁启超回忆《时务报》受欢迎的盛况,“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数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7]。此种传播效果,离不开“遍在的士林”,让《时务报》得以跨出口岸深入内陆,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在京师、天津、保定、开封、西安、武昌、长沙等地,至少存在46个与梁启

①“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最早源于人类学家吉尔兹用于强调“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的概念,后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即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若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条件。

超、汪康年、黄遵宪等重要人物关系密切的亲友派报处^[18]。但仔细来看,派报处大都设立在省府大市,鲜少直通县乡。尽管江西先后有四个派报处,但汪立元仍然坦言,“士大夫僻处乡隅,每以无从购阅为憾,甚至有不知《时务报》之名者。现除吉、赣、九江,外如饶、广及万载各处,均销报寥寥”^[19]。毛慈望则表示《时务报》中的言论能够对中国现状对症下药,为忧国忧民的读书人所企盼,只是“递寄太迟滞,不免美犹有憾,未厌人意。即如第十五册,系去岁冬月出报,直至本月初始到都门,其迟滞可想”^[20]。事实上,由于邮政和交通的局限,维新时期“无论书籍还是报刊,都很难确保稳定的流通管道”^[21]。此外,各省学政虽饬令府厅州县订阅分发,但真正到手和传递的效果却有待考量。一些省份虽有通知公告,但无实际账目往来,札令是否被实际执行不能一概而论。

上述内容表明,借由《时务报》的发行网络,维新思想似乎能够建立起联通全国的渠道。然而,无论是官府的采购发行还是依托士林而设的派报处,均会遇到命令执行不力、寄送太迟的问题。由此,从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来定义“维新”,判断其在地方上的影响,仅仅依靠《时务报》的发行还不足以给出定论。

维新时期,学会、学堂和报刊“三位一体”的设计成为观念传播的技术装置。“媒介中心主义”强调人们借助报刊阅读构筑现代世界/公共空间,但德布雷认为“观念都是成群而来的,一个孤立的观念是一个僵化的观念,活跃的观念会组团,而这些观念的持有者会结群”^[22]。当康有为“上书”陈述变法思想而遭到“语太讦直无益”“以狂生见斥”的讥讽时,他深感“合群力厚”的重要性。“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将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23]他还提出改书院为学堂,“若此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非独教化易成,士人之才众多,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24]。

湖南和广西可以说是以学会、学堂为依托,以报刊为引领的典型所在。南学会的成立得到

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地方官员的支持,兼有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推动,每七日集会讲演一次,探讨新政和救亡之策,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机关。湖南各府县州也纷纷响应,竞相成立学会,如长沙的“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浏阳的“群萌学会”,衡州的“任学会”,郴州的“舆算学会”,龙南的“致用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等。这些学会活动内容虽有不同,但均以南学会为总会,自为分会,且都抱定“联通群力,振兴新学”^[25]的共同宗旨。《湘报》转载南学会历次演讲,增加论说成分,并报道各省新政、本省新政以及时务学堂的招考试题,“以开风气,拓见闻”^[26]、“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27]。因此,《湘报》“各府风行”,梁启超称赞它是戊戌时期日报中的“巨擘”^[28];时务学堂的学生和南学会会员也是《湘报》的重要读者和撰稿群体,对于地处偏远的地区,陈宝箴则下令各州县官绅广为订阅,以及时通晓时务,并请各分会会友“转交居乡会友,择地张贴墙壁”^[29]。南学会、《湘报》和时务学堂充分体现了维新运动在地方通过报纸、学会和学堂“联为一气”的组织化传播。在广西,维新思想的传播有赖于圣学会、广仁学堂和《广仁报》,这与康有为在桂林的活动分不开。1894年12月,康有为受弟子龙泽厚的邀请来到桂林,会见了当地知识界代表,其中只有桂山书院山长周璜与康有为相谈甚得。周璜很欣赏康有为的才学,并为其引荐唐景崧、岑春煊和蔡希邠等人^[30]。由此,康一方面与广西官绅取得联系,一方面借讲学延揽人才,1897年第二次到桂林时即组织圣学会,并依据学会会章“刊布报纸”创办《广仁报》,报社附设于圣学会,经费由各方捐助,尤以唐景崧、岑春煊捐助为最多,主笔赵廷扬、曹硕、龙应中等均为康门弟子。

受康梁等人的直接指导与地方官绅的支持,湖南的维新运动起步早、发展快,成绩显著^[31];广西士人龙泽厚是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的16位发起人之一^[32],上海强学会被查封后,龙泽厚两次邀请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在康有为的指导下,

广西的维新架构——学会、学报和学堂建立了起来。简言之,由于康、梁等人的具体支持,湘桂两地的维新活动与京沪的时差不大。

三、时差:地方维新实践的不同时间线

如果说湘桂两地的维新活动与康、梁主导的主线上的活动基本一致,那么其他地方的维新实践则存在多种主体性表现以及各自的时间线。

(一)地方维新的“时差”

1873年创设的陕西味经书院是当地维新思想讲授与传播的核心地带,书院山长刘古愚被认为在开陕西省风气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被人并称为“南康(康有为)北刘”。这并非意味着二者的思想旨意相同,但也容易将差异淡化。这既反映出将地方纳入中心的倾向,也表明有一种待发掘的“地方性”的维新。

刘古愚在1875年中举后第二年入京会试不第即绝意科举,但他痛感列强入侵和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以教育为业辗转各地为塾师。弟子张鹏一回忆道:“时先生年近二十,已知东南受英法各国之逼,而通商传教,非中国本意……专求旧学,不足以维中国之局,而报章未兴,译书莫睹,惟以情理推测而已……”^[33]由此,刘古愚提倡新学、讲求实学的思想在19世纪中期即已形成。在危机加深、时局紧张的情况下,针对士子“讲诵考论以鹜于利禄之途而非修齐治平之事”^[34],他倾向于时务之学——1887年任味经书院主讲,讲授“致用”之学;1895年向陕西学政赵惟熙提议创建实学书院;1895年2月在味经书院创办时务斋,讲授西方自然科学、推崇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学;1895年,在味经书院创立时务斋讲会(长沙南学会的讲会活动则始于1898年),面向院内学生和社会中有志于时务的人士,延请宿学硕儒讲论实学。康有为于1895年10月在上海创办了强学会,11月刘古愚的学生、工部主事李岳瑞寄来了康有为历次上书诸稿及《强学会序》《章程》等,刘才知世有“康先生其人”。

四川维新活动的开展也有自己的时间线。被认为是“四川维新第一人”的宋育仁(1857-1931),自幼饱读诗书,在成都尊经书院受通

经致用的思想影响,1886年成为翰林院庶吉士,1887年在《时务论》中阐述了“复古即维新”思想,认为现代“西制”是《周礼》制度的翻版。该观点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1)《孔子改制考》(1896)(二书是康有为于1891-1898年在长兴学舍办学期间撰写^[35])中托古改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宋的维新主张早于康数年,甚至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正是受到宋育仁论著的启发^[36]。1886年宋育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87年写出《时务论》提出改革以自强的观点;1894年他以二等参赞的身份随从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考察英、法、意、比四国,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并写下《泰西各国采风记》,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术、学校、礼俗、教门、公法等五大方面,比较西方文明“与《周礼》所描述的上古善政的异同,以期为中国维新运动提供一个可供实行的标本”^[37]。1896年宋育仁奉旨回川办理商务和矿务,兴办实业,1897年10月创办宣传维新的报刊《渝报》以开风气,“蜀中山水僻远,一行省所督异郡县或不相闻,视外省京师已辽矣,得风气为最晚,……乃就邦人谋兴学报,先即重庆通衢开馆,为风教之先”^[38],开启了宣传四川维新运动的篇章。1898年执掌尊经书院,组织蜀学会并出版会刊《蜀学报》。由此,四川较早建立了书院、学会和会刊“三位一体”的变法设置。

由上,地方维新实践拥有各自的“时间线”和实践内容,它们或在1895年之前即有相应的维新思想表达和维新行动,早于康梁在京沪等地的学会、报刊、学堂“三位一体”的维新组织架构,或侧重实业,然后才有“三位一体”的维新组织架构。

(二)地方维新方法观念差异

在维新的具体方法上,地方士人的实践和康梁领导的实践也存在不同。以“开民智”为例,它是维新思想中几乎各个派别都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但刘古愚在具体方法上则不同。他强调兴乡学、行乡治,提出:“遍设乡学为第一要务”“乡治而国治矣”,表示“欲兴学校,当遍立乡学县学,而寓西人议院及地方自治之规模,即一学之人,治一学之事情,庶官师相合,政教一致”^[39]。

刘认为人人受教育就是人人实践政事,惟有人人有政治上的智识才能实现救国。在《烟霞草堂文集》中随处可见这种论述,如“乡间之蒙学为先,必先统乡间之农、工、商、贾、胥纳于学,然后为以学为政,然后能自立于今日之世”^[40]、“苟变教法广设于乡,三年,乡间之气象必改观”^[41],等等。从刘古愚的话语中能体现其对于“民”的认识,变法救国在于聚民兴学,而兴学不只是造士成才,更重要的是“化民成俗”,风俗与人才就像江河与蛟龙,“江河水聚而蛟龙生,风俗醇美而人才出焉”^[42]。其话中隐含之意是“地方性”和“乡野”对于育民的重要性。而康梁则认为,维新首先在“民智未开”的条件下,不能立即开设议院实施欧美的民主政治,实际是将政治运动与对普通士子的启蒙教育相分立。梁启超在《新民说》提到“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43]。在梁看来,妨碍“民”成为“国民”的原因正是“乡”与“族”的阻碍,而这恰恰是刘古愚维新实践中所重视的,“广人材”也包含着普通的乡村民众。如何看待“民”的问题背后,体现出对于维新观念的认识。正如陈旭麓所言,“戊戌”时期所揭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本是最具有启蒙的内涵,但开智和新德作为启蒙的钥匙,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仅停留在“开官智”“开绅智”的阶段,既没有“由省推之府”“由府推之县”,更没有“由县推之各乡镇”^[44]。启蒙的对象更多局限在士绅阶层,而刘古愚开展的“合群”可视为将地方乡土意识和时务致用思想结合的过程,是从士绅阶层下降到普通民众的尝试。

相较于当时的维新运动中心城市对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刘古愚在保守稳健的态度下有意无意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他将重心放在实业上,筹办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后因资金不足未能成行),寻求陕西学政赵惟熙的帮助获得资金支持并提出书院与工厂一体化,认为“机器为书院之根本,书院即机局之羽翼”^[45],书院为工厂培养

技术人才,乡人能够通过入股获利。刘还派弟子南下为实业争取多方支持,途中拜会重要官员、商人,考察和学习机器原理,并购买大量新书新报。此外,还大力推广桑蚕技术为农人带来便利,并将养蚕方法“编为俗歌,使媳女诵之”^[46]。刘古愚远离京沪等维新变法的核心地区,一生绝少踏出陕西,故很少有机会受到维新派中坚人物的直接影响。可以说,刘古愚在陕西围绕着实业开展新式人才培养、新技术运用和新知新学引进等,并强调身体力行启迪乡民,是一套系统性的地方维新实践。

四川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宋育仁是“具有敏锐时代触角的新锐人物”^[47],同时也是深具地方主体意识的士人。当京师《官书局汇报》、上海《时务报》、长沙《湘学报》先后出版,办报成为维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时,而蜀地士人不甘心被忽视,“急需得到举国承认”以彰显本地,因此,“宋育仁等在川办报,绝不止是为了四川,而是要为全国交流网络的近代化营造重要节点”^[48]。维新时期的居乡士绅自觉地展开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维新实践。换言之,中心和地方在维新实践的时间线和具体方法的差异,印证了维新变法实践中存在的“复线的历史”,也表明维新是一场中心城市和地方的士人参与的多主体的实践。

(三) 书院: 地方转达维新思想的中介

报纸、学会和学堂“三位一体”架构是维新思想传播的标化配置,但由于诸多原因真正实现这种理想化组合的情况并不多见,如蒙学会因经费短缺原计划“先办书报,后立学堂,后报纸勉力支持”^[49],而学堂一事则被搁置。即使经费充足,新式学堂的开办还存在风气未开、资金和师资有限等障碍。吴汝纶指出书院改学堂兼习中西之学,而“外省府、县书院束脩不过三百金,以之分请中、西两师,决无一人应聘”,且“通商都会之地,间有其人,若腹地则风气未开,安得千七八百兼通中西之师,以兴西学”^[50]。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对书院变更学堂持保留态度,“惟裁改书院一事,关系人才之消长、学术之纯疵,不可不熟筹审议”,“不探其本,眩于新法,标以西学之名,督以西士之教”,势

必会使传统正道遭到破坏,应“善变书院之法”,各取书院和学堂所长^[51]。

在没有学会、报纸和学堂的地方,维新思想的下传依赖作为中介的书院。贵州巡抚王毓藻对严修任学政期间对书院改革所做的筹备工作,在上疏谕折中提出:“惟学古书院臣严修,时与住院生于词章帖括之外,讲贯西学,孜孜不倦,士意翕然。臣因势利导,即改为经世学堂,其聘请山长,委监院管理如故”,其中包括“泛览中外时报及泰西各种书籍,以拓其眼界……”^[52]。事实上,从严修日记中可知,在学古书院变为经世学堂之前,新式报刊如《申报》《时务报》已在书院供诸生传阅。1897年3月15日记载“到南书院散时务报”^[53],8月9日收到“善后局送来的廿六、七、八三号《时务报》,各四十一分,即送玉峰(书院山长)处”^[54]。此外,严修还通飭地方学校劝谕诸生购阅《时务报》。

河南、山西、福建等地也颁布了书院订购报刊的谕旨。1897年,河南彰卫怀道岑观察颁布书院诸生阅览《时务报》的告示,各县购订的《时务报》需发给“住院诸生轮看”^[55];山西清源局规定各道府通判及各县书院应留报刊份数^[56];福建兴化府张太守规定“诸生于每月初一二日,超等上取前三名,遵诣监院处所亲领时报”^[57]。地方没有建立起“学会-学堂-报刊”的系统化的维新宣传体系,也没有得助于维新派核心力量的直接支持,书院充当了维新思想传入的中介,县乡学子通过进入书院的方式,获得接触新式观念和主张的机会。新式学堂未必适合基层的实际需要,而各地书院天然具有承接维新思想落地的优势,学子在学习经史的同时能或多或

少接触到新式思想,逐渐成长为变革的后备力量。

书院介入接引新知的过程,为学生带来了接触新知的机会,但这仅是部分的,对于地方士子而言,维新思想的获得既有条件也有限制。生于宦宦之家、常年寓居京沪的孙宝瑄,接触新式思想和事物并不难。他在1897-1898年的日记中记录自己数次造访《时务报》报馆、《苏报》报馆、《蒙学报》报馆、《亚东时报》报馆等,与汪康年、章炳麟等交谈或“购得《国文汇编》”,“携不缠足会之《女学歌》数册归”的情况。仅1897年他阅读的报刊书籍就包括《时务报》《知新报》《万国公报》《几何原本》《格致汇编》,亦即《新学伪经考》《治功天演论》等^①。

对于像孙宝瑄这样的地方士绅而言,对新书新报的获取和与维新运动关键人物的交往,都相当容易,但其他的地方读书人对维新思想的获取则需要依靠各种偶然条件。他们或托人在大城市购买新书如居住在上海周边的周越然^②,或靠同乡关系的交往网络来获取信息如浙江平阳士人刘绍宽^③。刘绍宽在日记中记载了自己频繁与同乡名流交往及西书西报阅读活动。而对于聚焦科举的地方读书人而言,对维新思想则怀有抵触心理。出身晋中耕读之家的刘大鹏此时专注于科考,1896年5月山西出现废学校、裁科考的谣言,让他感到“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法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58]。他对学堂的切身感受是科举入仕理想的幻灭,认为“学堂之害,良非浅鲜……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59],对新式思想和教育怀

① 见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社《孙宝瑄日记》(上)1897-1898年间的记录。

② 居住上海周边后成为藏书家的周越然回忆,自己尽管离上海仅300余华里,但并无出售西书的店铺,只能“抄录名目,托朋友代购”,他托一位在中西大药房当经理的孙姓商人,“每年每月托他购书,到20岁已经可以装满一小橱”。参见周越然《六十回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③ 《白沙刘先生年谱(未完稿)》中提到:“是时局势日变,新学萌生。乡人宋平子衡(即宋恕)在上海倡广西学之说,黄源初(即黄庆澄)与之游,屡有通信,于是知经世之务不在乎戔戔之科举。”宋、黄二人均系江浙一带有声望的新派士绅,并曾出洋游历,但对当地有开风气之功。1898年刘赴京参加拔贡考试,在近三月的时间里与陈黻宸、陈虬、宋恕、徐定超、黄绍箕等温州籍士人结识,他记录下宋恕的诸多言论如中外政治异同,以开民智、兴民权为主线的改革路线等,也进一步了解到《时务报》同人之争等重要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参见刘绍宽《刘绍宽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9页。

有抵触心理。查其日记,阅读内容较为单一,常读关于民生的奏折,有关阅读新书新报的记录寥寥无几,对时事的了解多来自乡里空间的流言网络。类似情况再如河南尉氏县的马重生,十八岁时遭遇科举改制,当时“不明白学校的好处,发生了误会”,后来停学改业,“如今想来追悔莫及”^[60]。

在维新思想的传播中,地方士子往往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保持对“新”的冷淡或利用。正如黄庆澄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所提到的,“敝局所存《时务报》,乡试前尚略有销路,乡试后无问津之人。此各主考学政之过也,可叹可叹。时务书局亦亏折一二百元”^[61]。可见,部分地方士子心目中的维新无法脱离制度的影响,无论是主动改变或被动选择,新式思想的传播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旧学影响的余波下。

综上,可以发现,《时务报》虽然行销海内外,学会、学堂在各地兴办,但对于地方士子而言,“维新”的接入则有各自的机缘与条件。家世优渥的孙宝瑄可近距离观望甚至亲涉其中,经济条件尚可的周越然通过商业代购为自己补充新知,身居县乡的刘绍宽借助同籍士人的乡谊搭建起进入新世界的桥梁,刘大鹏则一直寄望于科举,新式报章很少出现在其生活中。维新媒介触达地方读书人的方式,因家世、经济、交通、制度和观念的差异,以及地方士子对新式思想的了解程度、接纳方式以及传递时间均有不同。地方士人对“维新”的观感纷繁复杂,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士人观念由“古典”走向“现代”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存在。

四、何以有差: 维新实践的地方性成因

在中心城市的主流维新思想传入之前,部分地方士人已具备了维新的观念或一定的维新

实践,这意味着维新的“时差”。地方士人的维新实践与康梁维新实践存在的时差,显示了维新变法的多线条与时间线上的多样态。由康梁等维新巨子直接导引的地方维新实践,具有紧贴京沪等中心城市维新动态的优势,再加上地方士人和有关官员的支持,这些地方的维新活动几乎复制了京沪维新活动的“三位一体”的样式。在未直接得到康梁等维新指导的地方,当地士人承担起维新倡导者的角色。其维新实践中的思想来源,既有西学的影响和时局的刺激,也有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层基础,甚至早于康梁启动了维新活动。

刘古愚自幼受“关学”^①崇实致用精神的浸染,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成为他“因时变学”^[62]、接引西学,展开教育、工商、农业等领域实践的基点,后人评价他身上具有“志诚济世,忘身与家”^[63]精神;宋育仁1876年在成都尊经书院师从王闿运求学,深受王宣导经世致用实学^②的影响,王非常欣赏宋育仁,称他为“蜀士冠冕”^[64],在宋“其后的人生道路上,尊经致用也一直被他奉为圭臬,这个起点是在尊经书院奠定的”^[65]。地方士人从自身思想资源出发,调用乡土意识、经学词章等与时务变法之意相结合,促进地方读书人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地方士人的人生经历和主体性意识,也是考察地方维新实践差异的一个抓手。宋育仁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出洋考察欧洲数国,深具危机感和变革意识,并较早参与了康有为在京师的维新活动,因此他的活动范围大,职业经历相对丰富,也比较了解京师维新活动的内容,这些经历很容易在其返乡后形成中心和地方在维新举措和活动方面的鲜明对比,形成地方维新的自觉性。换言之,宋育仁具有鲜明的维新主体意识,加上他奉旨返乡的身份使他具备一定的协调当地资源

① 关学创始于张载,对孔子之道的传述、建构、护卫、践履,是关学的基本传统,注重礼教、经世致用是关学的基本特色。参见魏冬《何为“关学”?——基于关学谱系文献的观念考察》,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② 王闿运从1879年开始执掌尊经书院8年,他“将书院的八股试贴和书籍文章,统统搜查出来堆积一起,亲自点燃,一把火将其焚烧。以此引导生员研读经史百家,教人读书以致用”。参见庄增述《吴虞传》,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尊经书院“先后刊印了百余种书籍,除经、史、小学、舆地方面的书籍外,还刊印了部分有关时务的著作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参见何一民《试论尊经书院与四川士林风气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的能力,故较早地在四川建立了书院、学会和会刊“三位一体”的变法设置。

刘古愚和宋育仁均可视作相对于“中心人物”而言的“链接性人物”,他们或作为未能进入国家官僚队伍的地方精英,或作为任职翰林又出洋后返乡的官员,在地方和全国性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链接”并非单纯是从上至下的渗透,更包含着“地方性的转化”,即“维新”亦可是包含“乡土意识”的维新,也可以是“复古”的维新。

五、结语

在复线历史的视角下,京沪等中心城市与地方的维新思想传播和维新实践在时间和方式上相异,地方士人对维新思想的接受差异在时间上也参差不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维新观念传播过程中既要了解“时风”,也要看到“土风”^[66],前者是以《时务报》为首的维新报刊创办并广为流传,成为士人表达观点、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工具^[67],后者意指地方在不同时间、不同方式的维新实践,地方学堂书院在维新思想传播中的作用以及普通读书人对维新的理解。作为近代中国的改良运动,维新不仅活跃于京沪等大城市,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地方化的实践方式,并通过当地的维新设置,将维新思想往下传递,这样其社会层面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需要指出的是,探讨维新运动的地方实践并非关注新式观念接收的效果,而是发现在沿海通商口岸之外维新思想被多元理解的可能性。但是维新思想的地方化实践总体而言仍局限在识字阶层的动员上。相较而言,五四期间乡村动员中不仅出现非常多的白话、歌谣、三字经、顺口溜等口头文学,青年学生也将情感注入政治事件的表达中,引发村民的共情^[68]。因此,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并未将身处底层的群众塑造成政治变革中的行动主体,这或可视为地方维新实践的“无意识”与不足。

参考文献

[1]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 马叙伦年谱[M].卢礼阳,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8.

- [2][3][4][5]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3;5;17;224-225.
- [6] 王铨忠,李立雄.戊戌变法时期的学会、学堂、报馆分布图[J].历史教学,1982(09):65.
- [7][28][3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539;598;541.
- [8] 胡成.戊戌变法是一个多重系列的历史发展[M].文史哲,1998(05):18-19.
- [9][66]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60;181-186.
- [10] 李晨曦,阳美燕.维新运动与湖南近代报人群体的形成[J].国际新闻界,2016(06):141-160.
- [11] 蒋建国.维新时期地方学会、学校与报刊阅读的拓展:以湖南为中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02):1-9.
- [12] 王天根.西北出版中心味经书处与维新氛围的媒介建构[J].史学月刊,2009(10):36-46.
- [13]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 [14] 刘熠.地方的维新:戊戌前后四川省的办学运作[J].社会科学研究,2016(03):140-148.
- [15] 徐佳贵.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87.
- [16] 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15(06):123-137.
- [17]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901-12-21.
- [18] 朱至刚.跨出口岸:基于“士林”的《时务报》全国覆盖.新闻与传播研究[J].2017(10):89-102.
- [1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诗友书札(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28;27-28;2317.
- [21] 八百谷晃义.晚清维新运动时期政治宣传中的宣传册子[J].兴大人文学报,2016(09):47-76.
- [22] 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68.
- [23]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M].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133.
- [24] 康有为.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N].知新报,1898-08-27.
- [25] 汤志均.戊戌变法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242.
- [26][29] 湘报馆章程[N].湘报,1898-04-06.
- [27] 湘报叙[N].湘报,1898(01):1.
- [30] 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286-288.
- [31] 刘泱泱.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J].湖湘论坛,1998(04):53.
- [32] 汤志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371,720.
- [33] 张鹏一.刘古愚先生歿后二十七周年纪念文[J].陕西教育旬刊(第二卷),1934(32):60.

- [34] 刘光蕘. 学记臆解序. 刘光蕘集 [M]. 武占江, 点校整理.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43.
- [36] 徐溥.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 [J]. 社会科学研究, 1979(05): 22-29.
- [37] 杨云辉. 鼓吹“复古即维新”的宋育仁 [J]. 书屋, 2018(09): 39-43.
- [38] 宋育仁. 学报序例 [N]. 渝报, 1897(01): 8-9.
- [39] 刘熹亭. 刘古愚先生的教育改革论(下) [J]. 陕西省教育厅教育月刊, 1937, 3(08): 97-98.
- [40][41] 刘光蕘. 勤设学缀言. 刘光蕘集 [M]. 武占江, 点校整理,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644; 646.
- [42][45][46] 刘古愚年谱编委会, 编. 刘古愚先生年谱 [M].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89: 315; 127; 859.
- [43] 梁启超.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饮冰室文集》(三) [M]. 上海: 广益书局, 1899: 48-49.
- [44] 陈旭麓. “戊戌”与启蒙 [J]. 学术月刊, 1988(10): 43-49.
- [47] 唐丹. 宋育仁: 不该消失的“消失者”——《时务论》变法思想述评, 中华文化论坛, 2015(09), 94-99.
- [48] 朱至刚. 戊戌时期的四川士林与本省维新报刊——以宋育仁为切入点的考察, 新闻大学 [J]. 2019(07): 41-52.
- [49] 叶瀚, 曾广铨, 汪康年等. 蒙学公会公启 [N]. 时务报, 1897(42): 1-3.
- [50] 吴肇甫尺牘 [M]. 上海: 国学扶轮社, 1910: 11-13.
- [51] 胡聘之, 钱骏祥. 请变通书院章程折 // 戊戌变法(第二册) [M]. 中国史学会, 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298.
- [5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257.
- [53][54] 严修. 蟬香馆使黔日记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505; 545.
- [55] 河南彰卫怀道岑观察论河朔书院致用精舍肄业诸生阅时务报示 [N]. 时务报, 1897(47): 10.
- [56] 山西清源局通飭各道府州县阅时务报札(附章程) [N]. 时务报, 1897(32): 10-11.
- [57] 兴化府张太守购时务知新报发给书院示 [N]. 时务报, 1897(33): 11.
- [58][59] 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57-58; 163.
- [60] 张雪岩, 刘龄九, 编. 田家读者自传 [M]. 田家社出版, 1942: 78.
- [62] 刘光蕘. 改设学堂私议. 刘光蕘集 [M]. 武占江, 点校整理.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637.
- [63] 刘古愚教育思想研究会. 刘古愚研究论文集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5: 58.
-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 民国人物碑传集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341.
- [65] 魏红翎. 宋育仁与成都尊经书院 [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10): 138.
- [67] 李仁渊. 晚清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M]. 台北: 稻乡出版社, 2005: 145.
- [68] 卞东磊. 五四运动在乡村: 传播、动员与民族主义 [J].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19(04): 100.

The “time lag”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the localization of Reform thought in practice

Yu Muqin, Song Suhong

Abstract: Scholarly research on the spread of the 1898 Reform thought has been extensive, but the general focus has been on how the new-style ideas spread from the central cities to the local areas, often neglecting the practice of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thought in the lo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draws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newspapers, diaries, and memoirs to outline the activities of the reform practices in Shaanxi and Sichuan, and finds that the local reform practices had their own “timeline” and were not all inspired by the call of the center. The leaders of the local Reform Movement, as key figures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ional and local information, also made many “loc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ideas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bsence of the ideal “trinity” of newspapers, societies, and academies, the academy became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form thought on the ground in a wide range of counties and villages. The vision of the reform in the eyes of ordinary local readers also showed multiple faces.

Keywords: local reform movement; center; communication; subjectivity

Authors: Yu Muq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ng Su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